

关于作弊那些事儿

■赵宇彤

2024年12月31日,距离新年只剩几个小时,在成都市金堂县的沱江河畔,一名19岁的少女跳入冰冷的江水。事后,警方调查发现,该少女当天曾向朋友透露,因期末考作弊被老师发现,“担心受处分无法专升本”,并表达了轻生的念头。

考试作弊不是一件新鲜事。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2000人中,60.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或周围同学在大学期间有过作弊行为,66.6%的受访者感觉大学生作弊现象普遍。

考试作弊本质上破坏了学术诚信,作弊者必将自食其果。如何防止作弊再次上演,以及悲剧再度发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美国现代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代表人物伯尔赫斯·斯金纳看来,惩罚是控制行为的方法之一,通过施加负面刺激,减少某种行为的发生频率。然而,惩罚也是一门学问。如何有效惩罚?“一罚了之”有用的话,为何考试作弊始终无法根治?种种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惩罚不能“一刀切”

在我国,自隋朝开创“科举取士”起,就有人为追求“荣华富贵”铤而走险,选择作弊。

科举取才不仅关乎个人发展,更与社会稳定和国运兴衰密切相关,因此对科场舞弊者的惩罚也十分严厉,包括枷号示众、革除功名、杖责和发配等。《大清律例》甚至规定:“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官及应试者,应立即终止其该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作零分处理。”

然而,考试作弊的原因花样百出——有人深思熟虑,有人一时兴起,有人无奈为之,有人为利益所惑……简单的“一刀切”式惩罚既有失公允、违背公平性原则,也无法杜绝作弊乱象。

随着教育的规范化、科学化和人性化发展,当代高校对考试作弊的惩罚措施正从单一惩戒转变为“梯度式”惩戒体系,探索更精细的教育管理机制。

学术处罚是作弊的最直接后果,包括考试成绩作零分处理、取消考试资格、重修作弊课程等方式。比如,《上海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行为界定及处分规定》就明确规定,对考试违纪者和考试作弊者,应立即终止其该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作零分处理。

但单一的学术处罚的威慑有限,还需要与纪律处分的“铁腕手段”相配合,才能形成更强大的约束效果。

纪律处分是维护校园秩序的“红黄牌”,也是惩罚作弊的“耻辱墙”。当前,大多数高校的纪律处分包括书面警告、留校察看、记过和开除学籍等。

2021年,清华大学发布了《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对考试违规行为分了“位次”。如果考生只是交头接耳、互打暗号,但并未构成作弊行为,应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相当于“黄牌警告”;如果有携带考试相关资料、擅自使用电子设备检索等作弊行为,给予相关学生记过处分;若情况严重,抄袭他人或协助他人抄袭等则给予



图片来源:taufiao

留校察看处分;对部分多次作弊、组织作弊的“惯犯”,直接开除学籍。

学术处罚与纪律处分的“双线并行”,是大多数高校惩罚作弊行为的“常见套餐”。而对部分突破红线、挑战底线的作弊行为,法律追究就成了“杀手锏”。

2015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15名涉嫌“聘请他人替考”,通过合谋、伪造外国护照等欺诈手段获取虚假成绩的中国留学生,主犯面临最高55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在我国,2014年—2020年,有不法分子由于伪造、变造身份证案,安排面容相似、专业对口的“枪手”替考等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五年六个月不等。

从古至今,考试作弊屡禁不绝,惩罚方式却与时俱进,从严刑酷吏的惩戒到分层处理,既维护了公平,又兼顾了温度。

惩罚与教育的平衡

惩罚制度尽管已经明确,但其实际操作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归根到底,作弊惩罚的主动权掌握在教师手中。不同教师的主观判断不同,对作弊行为的惩罚也存在“弹性空间”。对部分老师而言,揪出并惩罚作弊学生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心血,倒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名誉教授斯蒂芬·戴维斯和美国圣迭戈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克·德里南联合出版的《校园作弊——如何认识和预防》一书发现,大多数教师都发现过学生作弊,但很少有教师采取有效行动,他们大多担心惩罚可能会导致预料之外的不良后果,或毁掉学生的学习生涯和未来前途。他们的顾虑不无道理。

2020年6月,中大大学软件学院某学生在补考中被发现作弊,离开考场后不久便选择了坠楼。2021年12月,日本大阪清风私立高中一名17岁的高二男生被发现考试作弊后选择自杀。其父母称,老师曾表示“作弊是胆小鬼的行为”。这位少年在遗书中清晰写道:“比起死亡的恐惧,我更害怕活着的时候被

认为是胆小鬼。”

这类悲剧不是个例,在世界各地都曾真实上演。这无疑敲响了警钟,让我们反思——考试作弊,难道人生就彻底“完蛋”了吗?

事实上,惩罚不是为了羞辱学生,而是让其认识到作弊行为的错误,从而在内心深处重建对学术诚信的敬畏,但这种建设不能一味依赖惩罚。正如斯金纳所说,惩罚不是理想的控制行为的方式,它可能在短期内起到威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

如何引导作弊学生在反思中成长,真正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目标?不少高校将目光投向柔性的处理方式。这既不是单纯的惩戒,更不是绝对的“放水”和纵容,而是通过关注学生当下的行为,引导其未来发展。

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规定从该学期期末考试起,违纪考生必须增修一门“诚信”课程,包括课内诚信教育学习和课外公益诚信劳动,合格后才能获得重修资格;2024年,西交利物浦大学启用学术失信积分制度,在积分“有效期”内,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学术诚信知识测试、参与维护并宣传学术诚信活动等途径,抵消一定的失信积分。

此外,部分高校也在探索社区服务的形式。比如,厦门大学便规定,对于拟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的学生,可以免于纪律处分,但需按规定参加适合学生身心特点、由学生工作处制定的社区服务。其中,拟给予警告处分的学生须完成40小时以上的社区服务;拟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的学生须完成60小时以上,原则上应在两个月内执行完毕。

犯错是一个人在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作弊也不意味着人生就此终结。惩罚固然重要,但关键是教育和引导,教会作弊学生从错误中学习,学会如何在面对诱惑和挑战时坚守道德底线。

根治作弊,关键在考场外

在考试作弊的拉锯战里,绳子的另一端攥在学生手中。

在作弊的认定和处理流程中,学生不应是完全被动的一方。为避免认定模糊或误判,应为学生提供申诉的机会和渠道。

美国常春藤联盟中的多所学校就设立了“荣誉委员会”(Honor Council),由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组成,学生成员通常由学生会或相关组织选举产生,负责调查、审议和裁决潜在的学术不端行为。在调查中,委员会成员与被指控的学生充分沟通,后者也有机会在听证会上陈述观点、提供证据或选择申诉,保障处理过程的公平和透明。

此外,作弊行为发生后,部分高校的荣誉委员会也会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和关怀,并称“希望大家对被发现学术不端的学生有更多的仁慈”。

要想根治考试作弊,预防至关重要,心理辅导就是其中一环。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曾为所有新生提供免费的抑郁症在线筛查服务,俄勒冈州的学生则被允许请“心理病假”,每3个月最多可以请5天假。在我国,集美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不少高校在学期初、考试前等敏感时期,也会安排摸排工作,对处于心理危机的学生进行及时疏导。

然而,心理疏导的作用终究有限。强化学术诚信教育、建设校园诚信文化才是根治作弊的治本之策。

“防止学术不诚实行为的最佳方法是教导学生将作弊视为道德问题。”美国佐治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卡特尼·卡伦指出,“制定荣誉准则和教育政策等措施对于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至关重要。”

荣誉准则是美国高校实施的一项旨在促使学生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的制度,倡导学生在考试前自觉签订荣誉声明,并提前告知学术不诚信的后果。卡伦发现,要求学生恪守诚信能大大减少学生的学术欺诈行为。在没有荣誉准则的学校中,71%的学生受访者目睹了其他学生作弊,而在有荣誉准则的学校中,这一比例则降至35%。

“学校的主要任务不是监测作弊,而是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学术不诚实行为是不能被接受和容忍的。”《校园作弊——如何认识和预防》一书指出,这是一场共同的“战斗”,需要学生、老师、家长和管理者共同参与。

然而,这场“战斗”为何始终未分出胜负?考试作弊为何屡禁不止,甚至花样更多、“玩法”更新?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判作弊更是难上加难。

事实上,当前学业成绩与奖学金、推免资格等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加之学业压力、同学之间的竞争、家长和老师的期盼,都导致了学生对成绩的过度追求和对失败的恐惧。功利心驱使下,依旧有不少人铤而走险,选择作弊。

因此,作弊这件“小事”,本质上牵涉着更复杂的教育问题:“一卷定乾坤”的方式是否合理?考试的内容如何兼顾知识与能力?随着在线考试和开卷考试的普及,对作弊的界定和惩罚能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种种追问下,我们应当始终明确,成绩与排名只是考查能力的标尺,而非唯一目标。那位19岁少女的悲剧,我们也不希望再度发生。

以交叉学科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多尔”经验

■秦博 祝刚

当前,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相关问题的解决亟须不同学科合作研究,提出具有创新性与影响力的方案,这也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然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通过化学、生物等单一学科方式进行,这种基于单一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难以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融合不同的学科思维与知识。

在国际知名研究型高校投入可持续发展议题的浪潮中,美国斯坦福大学多尔可持续发展学院(以下简称多尔学院)体现了以交叉学科创新合作研究方式应对全球气候挑战的特点。该学院在战略层面、组织架构、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创新型、交叉学科性、研究性与实践性,也成为了交叉学科创新学院的典范。

打造交叉课程,成立推进中心

多尔学院于2022年成立。作为斯坦福大学70年来设立的第一所新式跨学科学院,该学院致力于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打造一个跨越生物、物理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学科课程体系。其目标是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与资源,培养能应对当代全球性挑战的综合型人才。

这种交叉学科课程体系以问题为导向,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供创新性的学习和研究体验。例如,该学院的海洋学系推出首个学术型博士学位项目——海洋哲学博士学位。该学位项目以其独特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深入探索海洋问题的机会。课程内容涵盖了海洋生态学、海洋经济学、环境政策、海洋法、气候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影响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海洋哲学博士学位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环境中,运用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视角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攻读该学位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如何评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要深入探讨全球变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此外,该学位项目鼓励学生通过实践研究,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政策建议,为决策者提供理论支持,帮助解决当前海洋领域的关键问题。

该学位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的教学模式,倡导多学科协作与创新。学生不仅可以与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合作研究海洋生态系统的演变,还能与社会学学者探讨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甚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这种多元化的培养方式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知识和实践机会,使其能在应对海洋面临的复杂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多尔学院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以实现校方对促进气候和可持续性研究及解决方案的期许。这些举措包括建设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心(以下简称推进中心)、成立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探索资助计划,以及举办一系列相关会议等。

这其中,推进中心是将学院目标落实到实践,实现跨领域、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要中介。该中心采用制定“旗舰目标”的方式助力可持续发展研究定位。旗舰目标促使学院在一系列中长期期的时间框架内,将可持续发展从本土行动扩大到全球行动,同时促进学院有效识别和应对社会公平方面的挑战,从而帮助斯坦福大学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作出贡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推进中心采用了“确定旗舰目标—构想愿景—建立项目—运

作项目”的模式。该模式将可持续发展从理念转变为行动方案,并进一步将其推广并运用到实际情境中。在一系列的转化过程中,多尔学院可以统合其他各项举措,促进科研成果到大规模问题解决方案的转化。

创造包容文化,多部门协同培养

在多尔学院,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以开放、包容和协作为核心理念。这种文化强调知识与解决方案驱动型研究的相互交融,鼓励学者们在探索基础理论的同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该学院致力于将教师、学生和员工的多样化优势融入学术活动,使其专注于卓越的研究、教育、创新和服务,同时为社区参与提供包容性的平台,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

比如,为了展示学术成果并促进跨学科的知识联系,该学院发起了一个教师论坛系列。这一活动中,学院教师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进展,从技术创新到社会政策,从环境科学到人文哲学,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广泛主题。

此外,为了进一步推动跨学科合作,学院定期举办教师沙龙,邀请校内不同院系的学者和领导参与,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理念和潜在机遇。参与者可以讨论如何通过智能技术优化资源利用,或者探索艺术和文化在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的作用等。学院还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和交流平台,打破学科界限,推动知识的共同创造与共享。

同时,多尔学院还努力创造一种包容的文化,允许教师讨论相互冲突的观点。为此,该学院拟定了多样化的教职员工项目、研究生与博士后项目以及本科生项目。比如,该学

院的“学习环境中多样、公平、包容(DEI)与获取”项目让教员与学生参与关于DEI的对话,学院的院长与学生奖学金项目则可以支持学生实现自己的DEI愿景。同时,该学院还制订了地球科学与工程专业可持续性本科研究计划。该计划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本科生吸引到精心设计的夏季研究体验中,为他们申请美国各地的顶尖研究生项目做好准备。

此外,多尔学院还从校内不同院系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招募了一批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顶尖教学研究人员。该学院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中,通过招聘全球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顶尖人才,再增加60个教职员职位。2022年,就有6名新教员加入该学院,学术专长涵盖了冰川动力学、经济学、自然灾害的结构性恢复、大气物理化学等研究领域。

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看,多尔学院的知识生产主体要超越单一部门限制,进行多部门协同培养,以形成新型合作网络。目前,该学院正在积极招聘环境正义、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环境行为科学和“地球脉动”方面的教职员。未来,该学院将在可持续性、淡水和淡水获取、土木和环境工程、地球和行星科学、地球物理和海洋的全球治理等方面招聘新的师资。

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有质量”向“高质量”跨越的关键阶段,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为典范的教育体系必将置身于数字革命的浪潮中。在这一嬗变过程中,以多尔学院的课程体系和跨学科创新研究为典范的美国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可以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分别为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期,伴随着国内某些中学春季招聘的开始,“博士进中学”的话题再次引发了一些人的关注——先是今年年初,江苏省苏州中学公布2025年应届毕业生录用名单,13名被录用者中,有8人具有博士学位;不久前,长沙市雅礼中学也在其官网发布引进博士公告,表示将引进9名博士生。

应届博士生直接进入中学任教大概始于20多年前,人数的明显增加则以近两年为最。不仅是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的著名中学中外名校博士齐聚,“新一线城市”的著名高中也仿而效之。如果以前个别应届博士毕业生进中学还属于个人职业选择的话,相当数量的博士亦作如此选择,就不再仅限于个人选择,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状况以及研究生培养体系和策略是否合理的问题了。

“博士进中学”的现象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博士不仅是高教体系中的最高学位,也是拥有深造学识的标志,博士毕业生应该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或前沿科学研究才合适。事实上,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教学计划也多是以此为培养目标的。依照该标准衡量,博士进入中学任教自然属于大材小用。

不过,博士就业的现实已经在悄然改写传统标准。曾经“物以稀为贵”的博士学位变得稀松平常,其变化速度之快也超乎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统计数据与实际印象之间的反差。就全国总人口比例而言,博士学位不足万分之七,即使加上每年回国的海归博士,其比例也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近年来有关部门和高校积极扩大博士生招生规模的依据所在。而从应届博士毕业生批量进入中学任教,以及一些“双一流”名校招聘辅导员、普通行政或实验岗人员时也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的现象看,博士数量不少了,而是太多了。

数量自然具有客观性,但实际印象更反映民意,也更容易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判断。

“万分之七”的博士占比是就整个中国而言,并没有考虑国内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和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以北京市为例,其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招收的博士生在国内遥遥领先,博士在全市总人口的占比已超过了欧洲发达国家,并与美国持平,但这类数据并没有影响高校扩招的热情。因为培养单位天然地以为,作为首都,北京有义务向全国作智力辐射,扩招博士生也理所当然。然而,其他城市著名中学的“聘用人员公示”中,常能见到北大、清华博士毕业生的名字。这表明博士毕业生在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谋求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已不那么容易了。

在特定时期,追求规模效应具有合理性。但由博士生扩招政策自然也经过了综合考虑。但由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社会消化能力不尽如人意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因此,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出于无奈,一层一层地“向下就业”的现状,需要反思的恐怕不是他们“期望过高”,而是政策本身以及政策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问题。

近些年,国内大学普遍以就业为导向,博士就业也没被重视。不过,从类似博士进入中学数量日渐增多的情况看,持续扩招后的实际效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在进入中学任教的博士中,有一些是经过博士阶段学习后,感觉自己不适合从事科研工作而主动作出选择的,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因为选择读博的人总是抱有“节节高”的期待,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一定是会“向上”奋斗的。“逃离北上广”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自嘲,“进入中学”的几多无奈和几多不甘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赞美“博士进中学”者预设了一个虚假前提,即应届博士生选择中学任教是出于个人志向。殊不知,“后撤”选择与“躺平”愿望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中学招聘博士却有非常现实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增加博士学位占比提升本校在“中学排行榜”上的排名,同时依靠博士的科研经验争取更多“项目”。一方是要“卷”,一方是要“躺平”,除非一方让步,否则双方工作和生活态度上的矛盾实不易调和。有名校博士进入中学不到一年就另谋高就,即是一个证明。

衡量政策实效的另一个标准是投入产出比。众所周知,国家对博士培养的各种资源投入远大于本、专科生。而以博士从事本科生或专科生即能胜任的工作来判断,明显是资源投入和人才本身的双重浪费。

因此,就博士管理政策而言,需要优先考虑社会的消化能力;政策出台后,也需要制定更多积极的配套措施。例如,通过奖励式补偿,让那些“后撤”的博士毕业生重拾信心;在资源配置方面也需要相互协调,至少应避免出现类似非师范生与师范生争抢中小学教师岗位的局面。

从「博士进中学」现象,反思政策有效衔接问题